

胡適是怎樣一個人

華南人民出版社

库存书

內容介紹

本書包括九篇文章。這些文章，除第一篇是着重說明批判胡適反動思想的重要意義外，其餘各篇都是分析和批判胡適的反動思想的，其中有關於胡適的反革命醜惡歷史的介紹，有關於胡適的反動的實用主義哲學的分析和批判，還有關於胡適的反動的政治思想、文學思想、教育學觀點和歷史觀點，以及胡適的反科學的“考據”等方面的分析和批判。

胡適是怎樣一個人

*

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廣州大南路四三號）

廣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粵版字第一號

新華書店廣東分店發行

廣州印刷廠印刷

*

頁：565 · 787×1092 1/32 · 2 1/8印張 · 46,000字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200

定價 二角二分

編者的話

爲了廣泛開展對胡適反動思想的批判，我們特將『南方日報』發表的關於批判胡適反動思想的文章，收編成集，供各地幹部和知識分子學習參考之用。

華南人民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

目 錄

爲什麼要展開對胡適反動思想的批判？	張漢青(一)
胡適是怎樣的人？	凌 零(八)
胡適的實用主義哲學的反動本質	華 明(一五)
胡適實用主義方法論批判	華 明(二三)
胡適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政治思想	謝理淵(二)
胡適的反革命、反人民的文學思想	李左卿(四〇)
批判胡適的反動的教育學觀點	嚴永晃(四七)
胡適的反動歷史觀點和他的反革命目的	岑 谷(四八)
批判胡適的反科學的『考據』	逸 生(六〇)

為什麼要展開對胡適反動思想的批判？

張漢青

自從李希凡、藍翎兩同志提出了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錯誤觀點、方法的批判，對資產階級主觀唯心主義在古典文學領域中三十年來的統治發出了可喜的第一槍以後，反對資產階級主觀唯心主義的鬥爭，由文藝戰綫轉到整個學術領域，同時各方面的矛頭又很自然地逐漸集中到胡適身上。因為胡適是中國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頭子，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觀點、方法正是從胡適那裏承襲來的。目前對胡適反動思想的批判，正在全國範圍內繼續展開，這是思想戰綫上的一次嚴重的階級鬥爭，我們必須重視這次思想鬥爭，認識它的重要意義，並積極投入這個鬥爭，從而提高自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

胡適思想的反動性質和在學術界的流毒

胡適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革命分子，並且逃亡到美國去了，因此胡適在政治上的反動性是大家都已經知道的了。但是，胡適在學術思想上的反動性，並不是每個人都認識的。胡適是中國資產階級思想的主要的、集中的代表者，他所涉及的方面包括哲學、政治、文學、歷史、教育、語言等各個方面，他長期來所散播的反動思想的流毒，在中國的學術界、社會上

遠遠沒有被肅清，並且還繼續起着非常有害的作用。

自解放以後，全國學術界在黨的關懷教育下，經過一系列的運動，特別是經過思想改造運動，覺悟有了顯著的提高，承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領導地位。但是，胡適派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在學術界還有着很大的潛在勢力，也是顯明的事實。在我國學術界中，有些人雖然在學術研究上也曾付出了辛勤的勞動，但是由於他們的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沒有得到根本的克服，由於他們繼續運用着唯心主義的一套治學方法，因此仍然研究不出一個名堂來；有的人甚至只是把舊的東西來一個改頭換面，裝上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做外衣，繼續在羣衆中傳播，但一剝開皮來看，則仍然是舊貨色。比如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錯誤觀點，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雖然他三十多年來一直沒有停止過對『紅樓夢』的研究，寫過很多關於『紅樓夢』的文章，但他研究時所抱的觀點却是錯誤的，特別是在解放以後仍繼續用唯心論的觀點來研究『紅樓夢』，因此就只能落得一個『越研究便越覺得糊塗』的結論。

胡適反動思想的基礎是美國資產階級的實用主義（胡適把它譯爲『實驗主義』）哲學。什麼是實用主義呢？簡單地說，實用主義者認爲什麼事情有用、有利，什麼事情就是真理。胡適說過：『真理是人造的，只要有利就是真理』。這簡直是荒謬之極。事實上，實用主義者僅僅把對資產階級有用、有利的事情才看作是真理。比如剝削、壓迫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有利，因而剝削、壓迫工人階級就成了真理；『上帝』對資產階級統治勞動人民有用，而

『上帝』也就是真理。胡適爲了達到他反共反人民的罪惡目的，甘心充當了把這種反動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想傳入中國來的忠實介紹人的腳色，把實用主義的觀點滲入到我國學術界的各個方面，給舊中國的學術思想界普遍散布了極爲惡劣的影響。

在很長時期裏，由於胡適總是把自己裝成一副『學者』的面孔，當教授，做校長，辦刊物，似乎很清高的樣子，所以對某些舊的知識分子來說，他的許多露骨的、反動的政治言論固然毒害不淺，而他的一些所謂『學術性』的著作，他喊的『科學的方法』、『科學的態度』等，就更容易在一些知識分子中間發生欺騙作用。當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中國人民中間開始廣泛地傳播，各種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刊物不斷湧現時，胡適便氣急敗壞地叫喊『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叫大家不要『高談社會主義』，而去解決一些像人力車夫的生計和妓女的賣淫等『實際問題』；叫大家不要革命，只去做一點一滴的改良。當然，胡適所害怕和反對的並不是他自己所主張的『實驗主義』，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人民的革命鬥爭。正如在十年之後他自己所招供出來的，他當時之所以這樣提問題，無非是害怕和反對中國人民『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着鼻子走』而已。胡適吹噓他的『科學的方法』就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那末他是怎樣運用這個『科學的方法』呢？爲了反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號，他就『大膽的假設』中國沒有封建社會，也沒有帝國主義侵略，然後捏造證據說中國的『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又捏造證據，證明中國的貧弱，不是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是由於『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等『五鬼鬧中』

華』。試問，這豈不是睜大兩眼說瞎話，那裏有一點點科學的影子呢？胡適就是用這套偽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來欺騙中國人民的，其目的是爲了蒙蔽住中國人民的眼睛，使人民羣衆看不到真理，好讓他牽着鼻子走，去給帝國主義和反動統治階級効勞。

胡適反動思想在中國學術界、社會上的流毒，究竟有那些方面呢？

首先，就是他所販賣的實用主義哲學毒害了許多知識分子。這種毒害，不僅在於大學的哲學講壇，並且深入到其他學術思想領域之中，尤其是對教育界、歷史學界和文藝研究方面所造成的危害性最爲嚴重。如在教育界方面，胡適反動的實用主義曾經使許多教育工作者走入迷途。有些人因受胡適治學方法的影響，在教育學和教育史的研究中，往往喜歡在片斷的詞句和小問題上鑽牛角尖。又如在歷史學的研究方面，有許多人由於受胡適的錯誤的歷史觀的影響，在研究時作煩瑣的考證，把歷史看作變戲法，誇大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抹殺歷史發展規律，因而陷入主觀唯心主義的泥坑。

其次，就是他的政治思想在中國學術界、社會上起着非常惡劣的影響。胡適在政治上提倡『改良主義』，高喊『一點一滴的改良』、『教育救國』、『純學術』、『超政治』等，其目的無非是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反對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因而在學術界中造成了理論脫離實際、學術脫離政治的不良傾向，有許多人也就給胡適牽着鼻子到『故紙堆』裏去。同時，胡適又竭力宣傳親美、崇美、媚美的買辦奴化思想，拚命鼓吹剝削殖民地和本國勞動人民血汗的『西方文明』、『美國文明』，一筆抹殺我國所有優良的文化傳統，

主張『全盤西化』，這種十足的奴才思想在國內造成很大的惡果，特別是對一些知識分子，使他們喪失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最後，胡適所長期散布的極端自私自利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更不知毒害了多少青年學生。他打着個人自由和『發展個性』的旗幟，高呼『救國須從救你自己下手』，以達到他破壞青年學生的團結，使他們迷戀於所謂『自由自在』的生活，而忘記國家的利益。

由此可見，胡適反動思想在中國學術界、社會上的流毒是非常廣泛的。

當然，由於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儘管胡適挖空心思，到處奔走，充當他的美國主子 and 蔣介石賣國集團的鷹犬，但歷史的車輪徹底粉碎了他的夢想；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如燎原之星火蔓延全國，終於取得了全國的勝利，胡適這個反革命罪犯也只好像喪家之狗似地溜到太平洋彼岸去了。

爲什麼要批判胡適的反動思想？

今天展開對胡適反動思想的批判，是馬克思主義的戰鬥唯物主義和反動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之間的一場嚴重鬥爭，沒有這個思想戰綫上的勝利，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就將受到嚴重阻礙。因此，展開對胡適反動思想的批判，無疑是有着極其重大意義的。

第一、我國當前正處在向着社會主義社會逐步過渡的歷史時期，階級鬥爭是日趨尖銳和

複雜的，而思想鬥爭作爲階級鬥爭的一個方面更是如此。因爲我國現在是在帝國主義包圍的情況下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已被消滅和將被消滅的階級，都力圖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他們不僅要在政治上、經濟上進行抗拒以至於破壞，更要在思想戰綫上來和我們作鬥爭，也就是用資產階級的思想來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用唯心主義的世界觀來反對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他們用這種觀點和方法來抗拒改造，阻礙社會的進步，阻礙科學和文化的進步，阻礙建設事業的發展，並且腐蝕勞動人民。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們要把六萬萬人口的中國建設成爲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首先在思想戰綫上取得勝利，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武裝幹部和全體人民。因此我們必須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運動——宣傳辯證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目前我們要在學術界和在社會上清除胡適派反動思想的惡劣影響，也就是爲了擴大和鞏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陣地，以便保證在實際鬥爭中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

第二、如上所說，胡適反動思想的流毒是很深很廣的，而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世界觀是不會自行消滅的，並且直到現在還頑強地盤踞在人們的頭腦裏，如果不通過批判，唯心主義思想就不能肅清，辯證唯物主義思想也就無法確立起來。同時，我們要知道，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過去是、現在還是、將來也是同一切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思想作無情鬥爭過程當中發展起來、強大起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必須通過實踐戰鬥，才能掌握的。所以只有經過對各個具體問題上的徹底批判，才能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學術

界樹立真正領導的地位。所謂『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就是這個道理。我們黨從來就是重視宣傳辯證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的。當前黨所担负的任務更空前巨大了，並且今天比過去也有了更好的條件了，那末當然就更需要開展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運動。

第三、我們還要知道，批判胡適的反動思想，並不只是批判胡適一個人的思想，而是批判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今天我國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對於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是相當熟悉的，而胡適思想正是這種思想的一種典型。通過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代表人物的思想的批判，乃是宣傳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的一種最有效的辦法。由此可以加強我們對一系列的根問題認識，使我們學到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知識，使全國幹部提高理論水平和政治覺悟，向主觀主義進行鬥爭，改進工作，使廣大人民羣衆鄙棄資產階級思想，大大提高自己的社會主義覺悟，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因此，反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是每一個革命者的政治任務。我們要知道，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今天在廣大勞動人民中間，甚至在一部分共產黨員和幹部中間，都還有深刻的影響。我們決不能錯誤地認為這次的思想批判運動只是學術界內部的事情；也不能以為自己既沒有聽過胡適的課，也沒有讀過他的書，甚至以前還不知道有胡適這個人，因而就對胡適思想批判抱着旁觀者的態度。每一個革命者都應該積極地投入這個運動中去。

胡適是怎樣的人？

凌 零

一貫反共反人民的胡適，是美帝國主義爲了從思想上毒害和控制中國人民而加意栽培出來的文化買辦。雖然這個頭等戰犯已被中國人民打得抱頭鼠竄，逃到太平洋彼岸去了，但是，解放前三十年間他在中國到處散播的毒素仍未徹底清除，還有人把他看作『五四』運動的發起者和領導者，以爲他是學貫中西博通古今的文學家、哲學家、史學家、教育家。掛着『博士』招牌招搖撞騙了許多年的胡適曾經迷惑了不少知識分子，所以我們有必要在人民面前揭露他的反動本質，使大家認清這條美帝國主義的走狗的本來面目。

胡適出身於封建地主階級。據他父親胡鈍夫自稱，他家的世系可以追溯到唐朝的皇族。到胡鈍夫一代，還是官居知州的當權派。胡適的外祖父馮金灶是個太平軍的逃兵，在滿清皇朝殘酷地把農民起義鎮壓下去的時候溜回家鄉，立誓要恢復他的祖業。胡適的母親馮順弟爲了多得聘金來幫助爹媽，情願賣身給四十七歲的胡鈍夫做填房。胡適從小就接受封建思想的教育，念的第一部書是他父親自己編的，宣傳『子臣弟友，循理之正』，『名分攸關，不容稍紊』的『學爲人詩』。父親的『遺風』和九年的『母教』，在胡適的腦子裏牢牢地印下了『人心曲曲灣灣水，世事重重疊疊山』的欺騙權詐『處世哲學』，他自認從來不曾享受過兒童遊戲的生

活，倒是每年秋天跟着庶祖母到田裏去收租，看着佃戶打下穀子，和他家平分。這時候他已儼然是一個小惡霸了。這些都是他得意忘形地在『四十自述』中所招供的。

一九零四年，胡適到上海讀書，封建主義的傳統加上帝國主義的教育，使他變成了深於世故的惡少。據他在『留學日記』中追述，當時他『無高尚之思想，亦無靈敏之感情』，除了學到一些庸俗進化論，把名字由『洪驥』改為『適者生存』的『適』字之外，就是打牌、喝酒、叫局、吃花酒、以至發酒瘋、坐巡捕房。一九一零年，這個小流氓終於找到了賣身投靠的道路，考得了官費，憑藉美帝國主義『退還』的庚子賠款，到美國學做洋奴去了。

胡適在美國留學期間，就開始形成他的賣國思想，並且積極進行活動。這時候他已經認定中國是『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長進的民族』，『中國不亡，是無天理』，應該趕快變成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他反對辛亥革命，說他贊成漸進，不贊成革命。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國主義提出了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件』，五月九日，竊國大盜袁世凱簽字承認之後，全國人民萬分憤怒，留美學生也開會反對，胡適却在這時候寫了一封公開的信給中國留美學生月報，『勸告處之以溫和，持之以冷靜』（『我的信仰』），說袁世凱『此項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亦能剛，此為歷來外交史所未見』（『藏暉室劄記』）。及後袁世凱給人民打下台來，可恥地死去了，胡適還惋惜不已，說：『袁氏當是時，內攬大權，外得列強之贊助，儻彼果能利用此千載一時之機會，以致吾國於治安之城（這就是說，把革命鎮壓下去），則生榮死哀，固意中事耳。』（『藏暉室劄記』）當時留

美學生斥他爲賣國賊，是完全不錯的。

胡適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回到中國。這時候，他已經是受了七年訓練的美帝國主義的親信奴才。他抱着很大的野心，暫時不談政治，首先在思想學術界混出一個名堂來，作爲資本，處心積慮，等待時機，以圖發跡。可是，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一九一九年爆發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發展到『六三』以後，工人階級登上了政治鬥爭的舞台，革命怒潮日益洶湧，胡適這下子忍不住談起政治來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他更加積極地活動。他的政治是什麼呢？就是維護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奔走於滿清皇朝餘孽溥儀與北洋軍閥之間，上條陳、獻計策。中國人民要推翻封建，他却說『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中國人民要打倒帝國主義，他却說這是『海外奇聞』，照他看來，『租界與東交民巷是福地，外幣是金不換的貨幣，總稅務司是神人，海關郵政權在外人手裏是中國的幸事』（『國際的中國』）。他進故宮去見溥儀，稱溥儀爲『皇上』。他提倡所謂『好人政府』，而在他的心目中，『好人』除他胡適本人之外，就是他所歌頌的封建軍閥如段祺瑞、吳佩孚、閻錫山之類。所以他參加了段祺瑞召開的『善後會議』，稱吳佩孚爲『軍事天才』，閻錫山爲『模範督軍』。也正因爲他給封建軍閥出了一些主意，獲獎『三等嘉禾章』一枚。他一面叫人『少談些主義』，一面與他的師父杜威大肆販賣其實用主義，目的在於對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他反對中國共產黨，也反對孫中山，大罵孫中山準備北伐爲『倒行逆施』，稱讚反革命的陳炯明，鼓勵陳炯明『不妨做一個閻錫

山」。這時候，胡適這個政治陰謀家已經頭角大露了。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失敗之後，中國共產黨從城市轉入農村，創立了革命根據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開始了。這時有兩種反革命的『圍剿』：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胡適就是文化『圍剿』中的主將。他在一九三零年發表了『我們走那條路』一文，說中國的仇敵既非封建主義，也非帝國主義，而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這『五鬼』，特別是『煽動盲動殘忍的劣根性，擾亂社會國家的安寧』的『擾亂』，尤非消滅不可。他用盡一切惡毒的詞句，污蔑革命，污蔑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還大說其『王權』，支持蔣介石屠殺革命的人民，說『任何一個政府都應當有保護自己而鎮壓那些危害自己的運動的權利』。這時候，胡適和蔣介石，一文一武，難弟難兄的醜態已經很明顯。蔣介石向胡適『垂詢大局』，胡適則稱蔣介石為『氣度闊大』的『最高領袖』，極盡卑鄙無恥之能事。

反革命『圍剿』的結果，是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來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了東北。在這民族危機深重的緊要關頭，胡適公然主張不抵抗，認為這是因為中國人民的老祖宗造孽太深，才有這樣的災難，最好是自己『反省』、『懺悔』。第二年秋天，以李頓為首的國際聯盟調查團發表了主張帝國主義共管東三省的『報告書』，胡適居然說這是『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對該團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謝和敬禮』（『獨立評論』第二十、二十一期）。至於他向日本帝國主義獻策，教『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可以征服中國，這就是……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獨立評論』第四十二期），則是衆所周知的。

了。「滿洲國」成立後，他又在「全國震驚以後」一文中要中國人民承認自己不中用，要變成像他那樣甘做奴才的「雅量」。「何梅協定」簽訂，蔣介石答應把華北讓給日本帝國主義之後，他公然在「沉默的忍受」一文中說「這是強鄰的恩賜」。他說他不能昧着他的良心（！）出來主張作戰，要青年人學巴斯德，在法國被普魯士打敗了，要割地賠款之時，仍然埋頭在試驗室裏做化學試驗和微菌學研究，不問國家存亡。

抗日戰爭爆發，胡適被蔣介石派到美國當「大使」去了。這期間，他代表蔣介石簽訂了「中美互助條約」，出賣中國的主權。抗日戰爭勝利，他回到中國，大叫「做了過河卒子，只有拚命向前」，表示他雖然已經五十多歲，也不過是「微近中年」，還可以大賣氣力，幹其反革命的勾當。果然，他由北京大學校長而至偽國民大會主席，雙手接受蔣介石的偽「憲法」，領銜提出「戡亂條例」，確實「向前」得起勁。但是，革命的風暴是無法阻擋的，胡適終於只好逃到美國去了。這並不等於他已經銷聲匿跡。不久以前，美蔣簽訂所謂「共同防禦條約」後，他還在紐約公開發表談話，表示「十分滿意」，說這是「最佳的」條約。

胡適是個徹頭徹尾的賣國賊，無怪乎他說「秦檜有大功而世人唾罵他至於今日」（「南宋初年的軍費」），爲秦檜大抱不平。一古一今，兩人同屬遺臭萬年一類，是沒有疑間的。

有人說，胡適在政治上反動，在學術上到底是「有所建樹」的，在五四運動時也曾搖旗吶喊過一陣，不能完全抹殺。那末，且看他究竟「建樹」了些什麼，搖過怎樣的旗，吶過幾聲喊吧。

一九一七年，胡適提出了「文學改良芻議」。這個芻議，名符其實地只談改良，而且僅僅是形式上的改良。據他自己說，是因為不敢提起「革命」兩個字，其實這不是他敢不敢的問題，而是他本來就反對革命。「五四」時期，他說要創立「國語的文學」，要「言之有物」。只談形式，不談內容，說「言之有物」而抽去這個「物」的階級性，正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文學理論的特點。胡適前前後後寫了幾百萬字的文章，雖然不是文學，但都是「國語的」，言之也是有物的，問題在於這個「物」與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與中國人民的革命根本是敵對的。即使從形式上的改良來說，儘管胡適大言不慚地說白話文的局面沒有他至少也得遲出現二三十年，實際上也是虎頭蛇尾，混在人叢中喊了一陣子就節節退縮，終於鑽到故紙堆裏「整理國故」去了。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戰績」大抵如此。後來胡適還鄭重聲明他並未參加「五四」運動，說他那時正在上海歡迎杜威，在北京發生的事情與他毫不相干。至於文學創作，雖然他自己吹噓說在學校裏就頗有少年詩人之名，到如今，就數得出只有一本「嘗試集」。這本詩集出版後，只有三、四個跟他一唱一和互相標榜的如陳獨秀之流叫好，結果他只好在再版時寫了一篇「自序」，老着面皮「戲台裏喝采」一番。這就是「文學家」的胡適。他以歷史學家自命，說自己有歷史癖和考據癖。究竟他研究出一些什麼，考據出一些什麼，這裏不去詳述，只舉幾個例子。根據他的「研究」和「考據」，中國在西漢初年已經形成「資本主義社會」，王莽是「社會主義者」，中國古代的偉大詩人屈原並不存在，「西遊記」中的孫悟空不是吳承恩創造的，而是從古代印度史詩中搬來的，因為照他看來，中國人向來不善